

日常生活视域下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研究

刘世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日常生活视域下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研究

刘世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常生活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研究 / 刘世衡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0

ISBN 978 - 7 - 5203 - 3327 - 6

I . ①日 … II . ①刘 … III . ①社会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研究—中国
IV . ①D092. 7②G206.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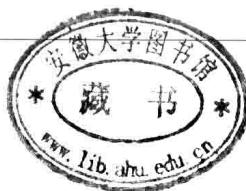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329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丽
责任校对 夏慧萍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169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项目资助

重庆社科规划项目“网络传播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研究”（2015YBMK007）成果

长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培育学科资助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意识形态的学理分析	(18)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起源	(18)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内涵、特征及功能	(27)
第二章 西方意识形态理论转向的日常生活维度	(36)
第一节 西方意识形态理论转向的日常生活维度	(37)
第二节 西方意识形态理论转向蕴含日常生活维度的 启示	(54)
第三章 日常生活的日趋媒介化	(59)
第一节 日常生活的理论渊源	(59)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哲学意蕴	(65)
第三节 日常生活的日趋媒介化	(69)
第四章 媒介技术变迁与意识形态传播	(82)
第一节 口语传播时代意识形态的传播	(83)
第二节 文字传播时代意识形态的传播	(85)

第三节 大众传播时代意识形态的传播	(88)
第四节 网络传播时代意识形态的传播	(93)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传播思想	(102)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传播思想	(102)
第二节 列宁的意识形态传播思想	(110)
第三节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传播思想	(113)
第六章 日常生活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的 演进历程与必然逻辑	(118)
第一节 日常生活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的 演进历程	(118)
第二节 日常生活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的 必然逻辑	(128)
第七章 日常生活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的 机遇与困境	(133)
第一节 日常生活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 传播的机遇	(134)
第二节 日常生活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 传播的困境	(139)
第八章 日常生活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的 策略	(147)
第一节 日常生活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形式的 融合	(147)
第二节 日常生活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叙事 方式的整合	(160)

第三节 日常生活视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话语 方式的整合.....	(170)
参考文献	(178)
后 记	(191)

绪 言

一 研究背景

网络传播的兴起得益于网络的发展，如果要追溯网络发展的历史的话，那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内容也涉及诸多学科。这里所要说的网络是指互联网，互联网的雏形是 1969 年诞生于美国的阿帕网（ARPANet），最初的阿帕网是由 4 台计算机联接而成，其目的是应用于军事领域。虽然随着技术的变革，互联网逐渐从军事研究进入商业领域，但早期的互联网所提供的服务仅仅局限于一个个的“信息孤岛”，还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真正互联，直到 1989 年万维网的提出才奠定了使互联网成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基础。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际互联网的商业化进程进入快速发展期。所以，有人说互联网，“它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从计算机工程学进入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之中，并进一步渗透到大众生活里”^①。网络从计算机工程学进入社会科学领域的时候，其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当这一概念从计算机科学中迁移至社会科学这一过程中，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个词变为描述一种新的社会化现象，这种现象具有的文化特征包含了个体主义文化，以及人

^① [英] 尼古拉斯·盖恩、[英] 戴维·比尔：《新媒介：关键概念》，刘君、周竞男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5 页。

群、商品、资本、符号和信息在全球的加速流动。”^①

网络的发展为传播提供了新的媒介技术平台，相对于传统的传播媒介，网络传播集多种传播形态于一体，其基本形态既有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也有大众传播，各种传播形态交织在一起，体现出网络传播的复合性媒介特点。而网络传播的形式更是多样，网络传播的典型形式有网站传播、即时通信传播、网络社区传播、博客传播、搜索引擎传播、维基传播、SNS传播和微博传播等。正是因为网络传播是由各种传播形态与形式的交织，所以才形成了一种异常复杂的传播过程。“在这样一种复杂的传播过程中，一方面，传播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传播方式的组合，以求实现传播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由于多种传播形态及形式的复杂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传播者的意图往往未必能得到充分实现，受众对于传播过程的影响十分明显。”^②

基于此，可以认为，网络传播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网络传播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新的手段，有利于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扩大传播范围，加大对网络受众的规范与引导；另一方面，网络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去中心化”的过程，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又是一个需要“再中心化”的过程，这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来说是一个挑战。因此，网络传播环境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就是一个“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动态辩证过程。

与此同时，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日趋媒介化，使得网络传播已经成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首选，这不仅是因为网络传播

^① [英]尼古拉斯·盖恩、[英]戴维·比尔：《新媒介：关键概念》，刘君、周竞男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② 彭兰：《网络传播概论》（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

占据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时尚的生活方式，也因为以计算机技术为中介的信息传播活动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线上网络从未与构成日常生活现实的社会网络分割开来。因此，以日常生活为视域来研究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就不失为一个好的研究视角，此其一。其二，这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捍卫意识形态话语权和传播权的需要。一旦失去传播权，局面将失控。“中东国家如埃及、突尼斯等，尽管当时执政党能牢牢地控制军队和经济命脉，但政府丧失了传播主导权，致使信息失控，流言、谣言、煽动性言论泛滥，内部机密泄露，引发全面政治危机。”^① 其三，这也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需要。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起着规范与引导作用，对社会秩序起着维护作用；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思想体系，对于普通百姓生活的影响隔着理性与感性的距离，因此，在日常生活日趋媒介化的今天，更需要通过网络传播的方式实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活化时代化大众化。换言之，在网络传播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更需要通过对网络传播方式的控制而实现有效传播，从而加强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引领和规范，彰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移动舆论场的声音，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总之，网络传播时代改变了全球意识形态传播的图谱，带来了意识形态传播的形式、叙事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的转换，也带来了意识形态传播向日常生活的转向。因此，牢牢掌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传播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不仅可以从学理上进一步地丰富

^① 李良荣：《网络与新媒体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和发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策略，而且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大众化生活化的时代要求。

二 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意识形态 (Ideology) 概念的首创之功要归于 19 世纪法国的德斯蒂·德·特拉西 (Destutt de Tracy)，作为孔狄亚克的学生，特拉西是一个典型的经验论者，相对于唯理论者来说，经验论者更加坚信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所以，对于特拉西来说，他想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一个真正的哲学基础，并把这个哲学基础界定为“意识形态”，这样，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观念学的代名词。但意识形态概念被提出来之后却遭到拿破仑的斥责，由此意识形态概念带上了贬义的烙印，并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才让它有了广泛的影响。自此之后，国外学界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就从未停止过，这种研究既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有非马克思主义传统。除此之外，国外学界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还包括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对意识形态形式和模式的研究，对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关系的研究，对意识形态与话语关系的研究，对意识形态与科学关系的研究，对意识形态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对意识形态与精神分析关系的研究，以及对意识形态存在方式、存在价值的研究等内容。限于篇幅，笔者就不一一加以论述了，这里主要就国外学者关于意识形态传播的研究作一个简介。

一是在论述意识形态其他问题中涉及意识形态传播，因而具有非系统性的特点。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葛兰西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霸权理论，他认为，一个阶级在主宰另一个阶级时，是通过控制文化内容，或者说通过文化领导权来达到大众同意的目的，从而牢牢掌握住统治权的，由此他最早提出

有关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及其物质载体问题。大约与此同时，威尔海姆·赖希也在其性格结构理论中认为，意识形态传播可以塑造作为沟通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桥梁的群体心理。艾瑞克·弗洛姆在其名著《逃避自由》（1941）中，以精神分析心理学为切入点对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心理根源和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以及自由的双重意义进行了深入剖析，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深刻地批判，同时他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造成了传播的不合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也涉及传播问题，其传播思想集中体现在意识形态对媒介的控制上，主要代表是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1964）和西奥多·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1964）。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70）中认为，国家的统治权力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维持，一是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维持，二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维持。在论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时，他从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角度分析了意识形态传播问题。

二是就大众传媒与意识形态传播的关系展开研究。阿尔文·W. 古尔德纳认为，意识形态的出现与传播革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历史关联。他通过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形成的早期研究，在《意识形态与技术的辩证法》中认为，大众传媒的发展与“公众”的形成是一种相互支持的过程，正是在“公共领域”的透明空间中，合理的意识形态话语出现了，并且通过报纸和有关媒体的传达，意识形态为激发社会运动服务。换句话说，意识形态通过报纸等大众传媒的传播来激发社会运动，因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被报纸、杂志、书籍所传播的内容所中介，所以说意识形态并非直接根植于日常生活经验，而是被新闻以及对于新闻的解释所中介。但与此同时，古尔德纳认为，随着广播、电影和电视的增长，意识形态丧失了大众基础，因为意识形态立足于一种精英政治，从而丧失了对大众的有效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因为只要

那自称代表所有人利益的合理话语支持着寡头政治的精英统治即可。^① 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认为大众传播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作为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的性质与传播范围，换句话说，大众传播“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运作的一种主要媒介，它的发展产生了一套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运行的新参数，大大扩大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运作范围，正是有了大众传播的发展，意识形态现象才成为大众现象”^②。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1964）以媒介为主要关注对象，在关注媒介的发展变迁过程中，更加关注媒介对人类的影响。他认为，媒介即讯息，意识形态传播本质上是传播的一种。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0）中认为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运作中的作用巨大，并研究了苏联《真理报》和美国媒体潜在的意识形态运作模式等经典案例。英国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之一，伯明翰学派的斯图亚特·霍尔在《“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1982）、《意识形态与传播理论》（1989）、《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等著作中，认为大众传媒是大众与主导话语进行意识形态争夺的主要场所，指出媒介所建构的信息渗透着浓重的意识形态性。皮埃尔·布尔迪厄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可以说，“大众传播及其行动者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问题是布尔迪厄后期社会学关注的重点”^③。在他的《宰制性意识形态的生产》（1976）中，他强调宰制性意识形态对新闻记者的控制，而公众则成了观众。但在《法国知识分子排行榜》（1984）一文中，布尔迪厄则认为，新闻记者已然成为政治统治的合谋，因为他们拥有强健的“媒

^① [英] 约翰·B. 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郭世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0—92页。

^② 范树成：《国外意识形态新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

^③ 张斌：《显影与祛魅——论布尔迪厄的媒介批评》，《现代传播》2015年第9期。

体肌肉”。在《新闻的影响》（1994）一文中，布尔迪厄进一步认为，新闻记者被认为是有自身特定逻辑和感知图式的相对自主的小世界中的行动者，而对于新闻记者所从业的新闻场，又与政治场和社会科学场之间存在着相互施加影响的关系。在《关于电视》（1996）中，布尔迪厄提出，以电视为代表的新闻场成了“维护象征秩序的了不起的工具”^①，因为电视成为一种制造现实的工具，强加给人们看世界的原则，这样媒体就在全球化与新自由理念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作用，从而使媒体成为“构成统治性言论象征力量的本质”^②。

三是就新媒体与意识形态传播的关系展开研究。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第二媒介时代》中论证了媒介的意识形态性。波斯特认为，媒介信息的传播其实是发挥着“建构主体”的功能，“就是媒介在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层面所发挥的‘主体’招魂功能，即被媒介信息方式建构的‘主体’实际上是‘他我’而不是‘主我’”^③，由此大众媒介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性。法国著名哲学家居伊·德波的景观意识形态就是建立在现代传播媒介得以广泛发展和运用的基础之上。他在《景观社会》中认为，景观代替了暴力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暴力意识形态权力，主要是通过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对人们日常生活欲望的控制。^④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更是在德波景观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景观”（中译本为《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作为美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凯尔纳抛开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二元

^① 张斌：《显影与祛魅——论布尔迪厄的媒介批评》，《现代传播》2015年第9期。

^② 同上。

^③ 李曦珍等：《解构“我说故我在”的媒介神话——媒介信息方式“构建主体”的语言学机制剖析》，《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④ 吴学琴：《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维度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144页，有改动。

对立的传统模式，以独到的媒介文化视觉，通过分析企业、个人和政府以大众传媒为渠道制造的“媒体奇观”，来研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运作的方式。2006年阿尔夫·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该书认为，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未来权力的大转移。Sally Johnson（莎莉·约翰逊）在《语言意识形态与媒体共舞》（2009）中还研究了语言意识形态与媒介话语的关系，而对媒介话语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来国外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四是就意识形态传播手段现代化进行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网络传播的强势来袭，“现代传媒成了政党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①，国外政党加大了对意识形态传播手段现代化的研究，并纷纷建立自己的网站，宣传政党意识形态、宣传政党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塑造政党领导人的亲民形象，增强政党的亲和力。

（二）国内研究现状

1. 国内对意识形态研究的总体概况

从国内的研究情况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就焕发出对意识形态研究的热情，而且这种热情有高涨之势，因此，有关意识形态研究的成果也是琳琅满目、不胜枚举。鉴于此，如果要对国内意识形态研究的方方面面都进行总结和综述的话，不但会流于形式，而且也难以抓住重点，给人以迷茫感。所以，对国内意识形态研究的总体概况，仅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概述。

一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以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由卢卡奇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陆续传入我国，由此引发了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热潮。主要有

^① 范树成、李海：《当代国外政党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及其启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3期。

王晓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2009)、孔明安的《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意识形态》(2012)、侯惠勤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著作评析》(2015)、林密的《意识形态、日常生活与空间》(2016)，以及汪行福、俞吾金、张秀琴等合著的《意识形态星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最新发展态势》(2017)。后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步形成的一种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传入我国之后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国内学界对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既有从总体上进行研究的，也有对后马克思主义者个体的意识形态理论展开研究的。张一兵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2003)率先对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介绍，李明的《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2011)系统论述了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还有学者主要对后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介绍，主要有韩振江的《齐泽克意识形态研究》(2009)、刘世衡的《难以摆脱的幻象缠绕——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2011)、莫雷的《穿越意识形态的幻象：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2012)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一方面学界在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新环境和新挑战时，加大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虚假性、欺骗性的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学界主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主要有包立峰的《意识形态幻象与晚期资本主义现实》(2016)等。

二是对意识形态理论本身、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对我国当代意识形态现实问题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最早对意识形态的起源、内涵、性质、功能及其发展作了系统地梳理。俞吾金在1993年出版了《意识形态论》，该书在2009年又出版了修订版，可以认为，该书是国内较早对意识形态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在20世纪90年代对意识形态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还有宋

慧昌的《当代意识形态研究》（1993）、姚大志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1993）、阎志民的《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学说》（1993）、吴建国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风云录》（1993）、杨生平的《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1998）、朱育和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情态录》（1999）等。进入21世纪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了系统介绍和文本学阐释，主要代表性著作有周宏的《理解与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2003），该书侧重于从文本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系统解读；张秀琴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2005）通过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创立过程的基本梳理，立足于当代，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当代阐释；侯惠勤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2010）通过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阐释，反思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信仰出现的新问题，并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新走向及其表现进行了深入分析。21世纪以来，学界还紧紧围绕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从和谐社会、经济全球化、网络、文化、宗教等视域，积极探寻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并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阐释了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主要代表性著作有郑永廷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2001）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2002）、王绍臣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2002）、杨立英和曾盛聪的《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2006）、杨海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研究》（2005）、童世骏的《意识形态新论》（2006）、戴焰军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2005）、郭文亮的《加入WTO与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2005）、黄传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研究》（2007）、农华西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